

跨国公共产品与跨国俱乐部产品有效供给的经济学分析^{*}

保健云

摘要: 可以把自由产品以外的经济产品区分为国家自用产品、跨国公共产品与跨国俱乐部产品三种类型;国家自用产品主要由本国生产和提供,跨国公共产品则需要由世界各国联合提供,跨国俱乐部产品则需要由多国联合提供;跨国公共产品与跨国俱乐部产品总量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和比重会不断提高,跨国公共产品与跨国俱乐部产品的有效供给是跨国经济合作的基础。

关键词: 跨国公共产品 跨国俱乐部产品 有效供给

一、引言

在国际社会中,随着国家之间在社会、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之间的交往程度与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彼此之间相互交往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的需求增大,但仅仅依靠一国的力量难于提供能够有效满足跨国交往需求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因为这些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具有跨国公共产品(multinational public goods)的特征,存在着单方面供给激励不足问题。公共产品是与私人产品相对应的,是指具有非排他性在消费方面具有非竞争性的产品,又可以区分为纯公共产品和俱乐部公共产品。根据地域范围的不同,可以把公共品区分为地方公共品、全国公共品、跨国公共品和全球公共品。跨国公共产品同样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在消费和使用方面存在免费搭便车问题,导致单方面供给积极性和激励不足问题。跨国公共品供给不足不仅影响国家之间的各方面的交往,影响各国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和资源的跨国配置优化,也影响到合理高效的国际分工的形成和优化,最终影响到各国居民的社会福利和世界经济的长远发展。

如何协调国家之间的跨国公共供给与需求方面

的分工合作关系已成为改善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特别是贸易投资关系的关键和核心。如果不能很好地协调国家之间的关系,形成一个高效有序的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关系与机制,则不可能解决跨国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和搭便车问题。如何改善跨国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并形成互利双赢的国际经济关系,形成高效有序的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关系和机制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跨国公共产品与跨国俱乐部产品的类型、最优配置条件及其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效应。本文共分五部分,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分析跨国产品的类型,第四部分分析跨国公共产品与俱乐部产品配置及其影响效应问题,第五部分是结论和对策建议。

二、现有研究文献进展及存在的不足

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是国际经济关系特别是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政策协调关系的重要内容和基础,但对跨国公共品供求对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特别是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影响的研究却一直为传统的国际主流贸易理论所忽视。虽然英国古典经济学

^{*}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经济转型期地方利益冲突与政府统筹区域研究”(项目批准号:05CJL027)、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The Asia Research Center 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资助项目“中国与亚洲转型国家区域合作研究”(项目批准文号:亚研字(2005002))和中国人民大学“985”自由探索项目“中国经济转型期面临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与开放经济部门发展战略与选择研究”(项目编号:01458230)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批准号:06CJY025)的资助。本文也是作者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经济学系做 Erasmus Mundus 访问学者(2006-2007)期间的研究成果,感谢合作教授 Wim Meeusen 博士和项目主任 Mieke Vermeire 女士的关心和支持,同时也感谢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提供的研究经费资助。

的代表亚当·斯密(AdameSmith,1726-1790)早在1776年就在批评以ThomasMunn(1571-1641)为代表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家们只强调贸易盈余重要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分工与绝对优势理论,把分工与绝对优势作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强调分工对国家之间贸易关系形成的重要性,但不可能把外部性和跨国公共品等现代微观经济学基本分析工具纳入其理论分析框架之中。大卫·李嘉图(DavidRichardo,1772-1823)在扩展亚当·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虽然论证了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能够给贸易参加国带来利益,但没有分析贸易利益如何在贸易参加国之间分配、国家之间贸易形成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条件。赫克歇尔(EliHeckscher,1919)和俄林(BertileOhilin,1933)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对一国国内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存在差异,但仍然忽略了对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基础设施和制度条件进行分析。由克鲁格曼(PaulKrugman)、赫尔普曼(E.Helpman)等学者发展的新贸易理论(newtradetheory),G.M. 格罗斯曼和 E. 赫尔普曼(GeneM.GrossmanandElhananHelpman,2002,pp.199-232)发展的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之间的相关关系理论,都没有分析跨国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对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影响和重要性。

在传统的主流公共经济学研究文献中,往往把公共品区分为全国性公共品与地方公共品(local publicgoods),对跨国公共品供求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相对缺乏。正如AgnarSandmo(1987,pp.1061-1066)所认为的那样,以PaulSamuelson(1954,1955,1969)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对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和最优配置从理论上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与规范分析,但在实证研究方面有待进一步改进。PaulSamuelson较早提出并部分解决了公共支出理论的一些核心问题,一是定义集体消费物品,二是分析生产公共产品所需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标准和条件,三是分析与公共产品相关的公共部门支出和税收收入的效率、公平与制度安排,但没有涉及到跨国公共品供给与需求分析。J.M.Buchanan(1968)不仅对公共品的供给和需求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并从公共选择(publicchoice)的角度展开分析,还以俱乐部理论(clubtheory)对公共品供给的效率条件进行解释(1965,pp.1-14)。对地方公共品供求及其效率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献较多,涌现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文献,一些学者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平新乔、白洁,2006;徐梅,2001),有的学者对国际公共品或者全球公共品的供给与消费研究文献进行

了综述(樊丽明、石绍宾,2003),但缺乏国家之间在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跨国公共品供求的理论与实证文献。

以CharlesP.Kindleberger(1973)、RobertGilpin(1981)为代表的一些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最早把公共品和公共成本概念引入国家之间经济关系分析框架。CharlesP.Kindleberger认为,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不可能完全依赖市场自身力量,必须有一个国家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提供维持世界经济体系稳定所必需的公共产品,关心公共利益并愿意承担公共成本的国家就是世界经济体系的领导者。RobertGilpin(1981)认为国际体系是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他在边际收益、边际成本等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理解国家行为变化、国际体系变迁的一系列假说,对国际体系变迁的内在动力进行解释。同时,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已经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的重要内容。RobertGilpin(2001)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有价值的评述,他注意到新制度主义、国内政治学与政府间主义已经成为研究区域经济与政治一体化的政治学者们发表的研究文献的主要特点。虽然公共品和公共成本概念已经在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被广泛采用,但在国际社会中公品的类型与有效供给的评价标准、与国内经济活动中公共品的主要区别等方面还没有达成共识,需要深入而系统地完善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外部性、跨国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实证研究文献仍然相对不足,理论模型的形式化和规范化仍然有待进一步提高。

还有一些学者从国际贸易制度安排、国际贸易与地理区位、公共实施区位与公共选择博弈、跨国经济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学角度对跨国公共产品供求与国家之间经济关系与分工合作进行了系统研究。PascalisRaimondos-Maler和AlanD.Woodland(2006,pp.79-91)从非优惠型贸易俱乐部(non-preferential tradingclub)和优惠型贸易俱乐部(preferentialtradingclub)的角度分析国家之间的关税制度改革对国际经济组织成员国与非成员国的福利影响效应,以FedericoEtro(2002,pp.187-211)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关注到经济联盟中国家间的政策合作问题。PaulKrugman(1991、1993、1995)把地理区位因素引入区际分工合作的理论分析框架之中,从规模报酬递增与经济活动地理分布构建两区域与多区际均衡模型,对制造业“核心”地区与农业“边缘”地区的形成与分工合作关系、“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形成与分工合作关系进行内生解释,已成为新经济地理

学研究文献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博尔吉·约翰松、乔治·莱奥纳尔迪从多区域多权力机构的决策环境的角度对公共设施区位选择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总结(2001,pp.123-158)。陈岩等学者则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国际贸易一体化中的公共选择博弈、国际货币一体化中的权力分配问题进行理论分析(2001,pp.239-293),同时对国际一体化的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2001)。

可见,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公共品与公共选择、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文献中,虽然对公共品供求及其效率、国际经济关系及国际经济合作的研究文献较多,但把外部性、跨国公共品供求作为基本分析工具,纳入到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特别是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的理论文献还没有出现。理论与实证研究文献的不足和缺失,在现有的文献和理论框架下,我们对国家之间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经济现象,例如区域一体化程度与绩效差异、国家之间贸易投资关系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设施和制度障碍等,难于进行系统而深入的解释。

三、国家自用产品、跨国公共产品 与跨国俱乐部产品:定义与解释

近年来,引入公共品作为基本分析工具,从经济学角度对跨国区域经济合作、跨国经济组织与联盟等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的研究文献日益增多。Alberto Alesina, Igazio Angeloni 和 Federico Etro (2005, pp.602-615)以欧盟为案例,以相关研究文献特别是由Wallance Oates (1972)开创、近期得到Timothy Besley 和 Stephen Coate (2003)、Ben Lockwood (2002)发展了的财政联盟主义研究文献,在政策一致性条件下国际联盟规模内生决定研究文献(Alesina and Vittorio Grilli, 1993; Alesina and Robert Barro, 2002; Sang-Seung Yi, 1996)为基础,把跨国公共产品供给的成本与收益纳入国家的目标效应函数模型之中,认为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导致更多的外部性,为跨国合作和超国家权力的创造提供了条件,国际联盟作为一个由多个成员国构成的一个集团,该集团统一公共品和政策的供给,在成员国之间产生外部性影响效应,由此分析紧密型与灵活型国际联盟的规模、范围、扩大、责任分摊、政府之间的转移支付及其竞争。目前,与外部性、跨国公共品供给和国家之间区域经济合作相关的研究文献,更多地吸收了政治学、社会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观点、研究方法和视角的有益成分,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综合态势。

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程度日益深化的国

际社会中,如果没有一定的基础设施条件和制度安排作为保障,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也不可能顺利展开。因此,国家经济活动的外部性使得国家之间区域经济合作具有必要性,跨国公共品供给不足或者低效限制了国家之间区域经济合作的规模、方式和绩效。但国家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制度规则提供与一国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制度规则提供存在较大差异。为了分析跨国经济活动与国家之间区域经济合作中基础设施建设与制度规则提供问题,本文引入跨国公共产品(multinational public goods)、国家自用产品(national private goods)、跨国俱乐部产品(multinational club goods)、跨国自由产品(multinational free goods)。跨国公共产品是指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消费与使用的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非竞争性消费与使用是指全世界任何国家的消费者、厂商和政府对该产品的消费和使用,都不会减少其他任何国家的消费者、厂商和政府对该产品的消费和使用,在全世界范围内增加对该产品消费和使用的边际成本为零;在全世界范围内非排他性消费与使用是指全世界任何国家的消费者、厂商和政府都可以免费消费与使用,例如,全球环境保护、全球公共安全、全球性国际组织提供的制度安排和规则体系等。

事实上,跨国公共产品是一种全球性的纯公共产品(pure public goods)。国家自用产品指只能由本国消费和使用、其他国家不能消费和使用的产品。在以整个国家作为利益主体和经济活动主体的情况下,国家自用品在消费和使用过程中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一国对该产品的消费和使用必然排斥其他国家对该产品的消费和使用,一国在消费和使用该产品时必须支付费用。跨国俱乐部产品是指各国在消费和使用时具有非竞争性但有排他性的产品,即一国对该产品的消费和使用并影响其他国家对该产品的消费和使用,但只有支付了费用的国家才能够消费和使用该产品。跨国自由产品是指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消费和使用都具有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例如能够被全世界消费者或者生产者免费消费和使用的空气、水资源等。一般而言,国家自用产品应该由本国生产和提供、跨国公共产品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提供、跨国俱乐部产品应该由需求该产品的国家联合提供。图1为判断国际社会中产品类型的方法和过程。

在图1中,我们根据产品的竞争性与否和排他性与否对国际社会中的产品类型进行判断和分类,为国际社会中的产品生产与供给、消费与需求决策提供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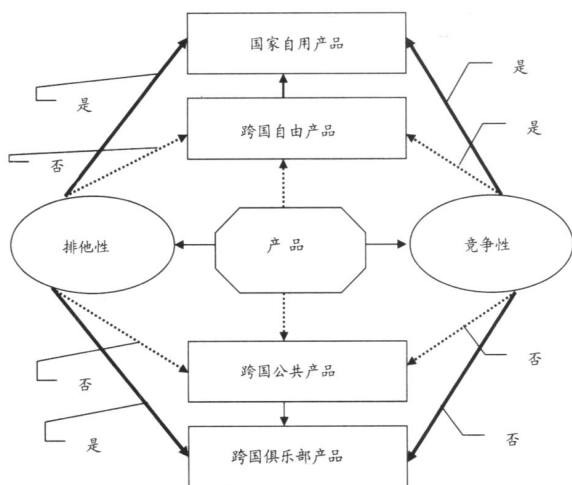


图1 国际社会中产品类型的判断

四、跨国公共产品与跨国俱乐部产品有效供给的经济学分析

现在假定由 n (n 为大于或者等于 2 的自然数) 个国家构成的一个国际社会, 当 x_w 为整个国际社会拥有的国家自用产品的总量, x_i 为代表性国家 i 国拥有的国家自用产品的数量, 则存在如下关系: $x_w = \sum_{i=1}^n x_i$ 。如果 x_w 为整个国际社会拥有的国家自用产品的总量, x_i 为代表性国家 i 国可以使用和消费的跨国公共品的数量, 则存在如下关系: $x_w = x_i$ 。如果 x_w 为整个国际社会拥有的跨国俱乐部产品的总量, x_i 为代表性国家 i 国可以使用和消费的跨国俱乐部产品的数量, 则存在如下关系: $x_i < x_w < \sum_{i=1}^n x_i$ 。如果 x_w 为整个国际社会拥有的跨国自由产品的总量, x_i 为代表性国家 i 国可以使用和消费的跨国自由产品的数量, 则存在如下关系: $x_w = \sum_{i=1}^n x_i$, 但 x_i 的消费和使用成本为零。

现假定有两个国家 1、2 构成的国际社会 ($n=2$), 当整个国际社会能够提供的产品 x 的总量为 x_w 时, 该产品在 1、2 两国进行分配的数量分别为 x_w^1 、 x_w^2 , 则可以得到如下消费可能性曲线 (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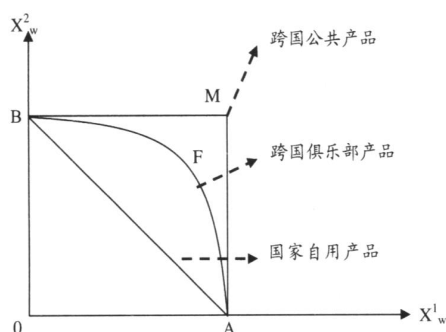


图2 跨国公共产品、跨国俱乐部产品、国家自用产品的消费可能性曲线

在图 2 中, 横坐标表示 1 国可以消费和使用的产品, 纵坐标表示 2 国可以使用和消费的产品, 消费可能性线 AB 表示该产品为国家自用产品, 消费可能性折线 AMB 表示产品为跨国公共产品, 消费可能性曲线 AFB 表示产品为跨国俱乐部产品。

在一个由多个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中, 跨国公共产品、国家自用产品和跨国俱乐部产品的生产与供给、消费与使用需要花费成本。在短期内也就是当跨国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提供过程中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中至少有一种不能调整或者来不及调整时, 在边际报酬递减或者边际成本递增的情况下, 跨国公共产品、跨国俱乐部产品和国家自用产品的生产与供给的总固定成本 (total fixed cost, TFC) 保持不变, 总可变成本和总成本 (total cost, TC) 随跨国公共产品数量的增加逐渐递增, 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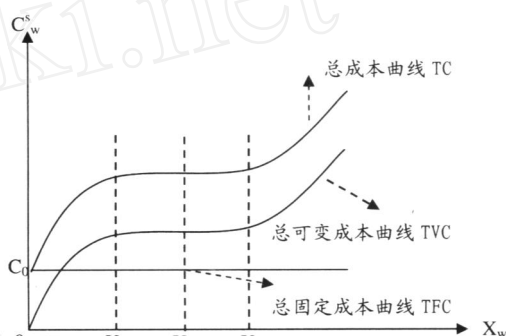


图3 跨国公共产品、跨国俱乐部产品与国家自用产品的短期总成本曲线

在图 3 中, 横坐标表示产品生产与提供的数量, 纵坐标表示生产与提供的成本, 总固定成本曲线 TFC 为水平线, 总可变成本曲线 TVC 与总成本曲线 TC 向右上方倾斜, 三条垂直虚线表示产品供给规模分别为 X_1 、 X_2 、 X_3 的三种情形。同样, 在边际报酬递减或者边际成本递增情况下, 无论是国家自用品、跨国公共产品还是跨国俱乐部产品的短期平均固定成本 (average fixed cost, AFC)、短期平均可变成本 (average variable cost, AVC)、总平均成本 (total average cost, TAC) 和边际成本 (marginal cost) 的变化规律如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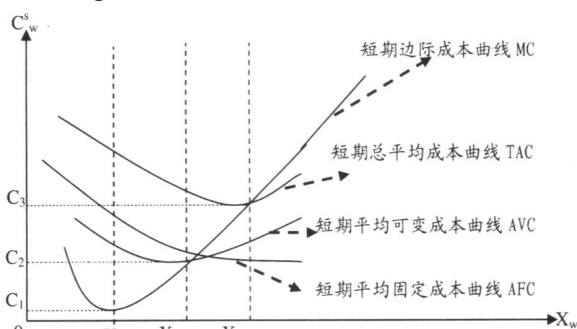


图4 跨国公共产品、跨国俱乐部产品与国家自用产品的短期平均成本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

在图 4 中,三条垂直虚线仍然表示产品供给规模分别为 X_1 、 X_2 、 X_3 的三种情形。除短期平均固定成本曲线 AFC 以外,短期平均可变成本曲线 AVC、短期总平均成本曲线 TAC 和短期平均边际成本曲线 MC 随着产品的生产与供给数量的增加,初始阶段递减,当递减到最低点时再逐渐上升。事实上,跨国公共产品与跨国俱乐部产品的生产与供给需要多个国家的协助与配合,受到多种因素特别是各国投入能力、投入意愿、利益分配、政治社会因素、国家关系、跨国制度安排与规则体系等的影响和制约,在有限范围内很难做到等比例或者同方向增减投入要素。因此,跨国公共产品与跨国俱乐部产品的生产与供给更多地表现为短期生产与供给的成本特征。当然,在产品生产与供给的技术水平保持稳定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国家之间的一体化程度较高、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更为密切,在共同扩大生产,提供跨国公共产品和跨国俱乐部产品时能够根据跨国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原则投入生产要素和配置资源,则跨国公共产品与跨国俱乐部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会表现出长期生产与供给的特点,即在生产和供给跨国公共品与跨国俱乐部产品过程中各国能够相互配合等比例或者同方向增加投入的生产要素,如图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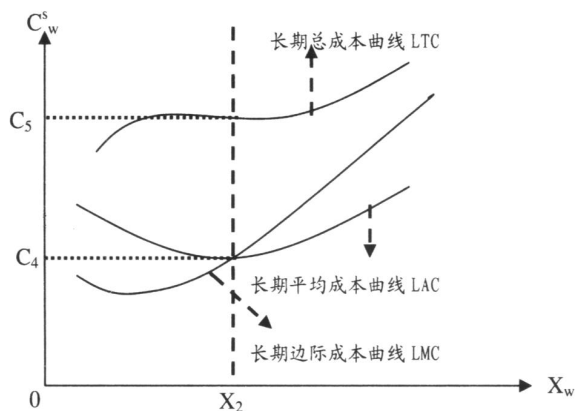


图 5 跨国公共产品、跨国俱乐部产品与国家自用产品的长期生产与供给成本

在图 5 中,横坐标表示跨国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与国家自用产品的长期生产与供给数量,纵坐标表示生产与供给成本。事实上,在国际社会中,对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贡献越大、影响程度越深的跨国公共产品和跨国俱乐部产品的生产和供给更能够以长期方式进行生产和提供。然而,跨国公共产品、跨国俱乐部产品与国家自用产品的使用和消费时,虽然都必须支付必要的成本,但支付的总成本却存在较大差别。跨国公共产品在使用和消费过程中,与单个消费者消费与使用时的总费用相同即边际消费与使用成本为零。跨国俱乐部产品在消费和

使用过程中存在着拥挤现象,但在达到一个临界点以前,其消费和使用的边际成本为零。如图 6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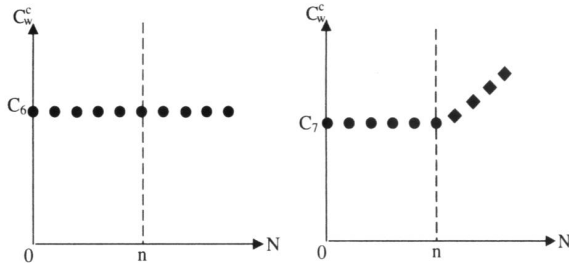


图 6 跨国公共产品与跨国俱乐部产品的消费与使用成本(分配成本)

在图 6 中,横坐标表示国家数量 N (自然数),纵坐标表示使用跨国公共产品与跨国俱乐部产品的总成本, n 为现有的参与跨国区域经济合作或者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国家数量。左图表示跨国公共产品的消费与使用总成本,当超过 n 的国家加入对跨国公共产品的消费与使用时,总消费与使用成本线仍然为一水平线,无论是参与区域经合作的国家数少于还是多于 n ,边际消费与使用成本都为零。右图描述的是跨国俱乐部产品的总消费与使用成本情况。当国家数量小于 n 时,消费与使用总成本曲线为水平线,边际消费与使用成本为零,但当国家的数量大于 n 时,消费与使用的边际成本会逐渐增大,当加入的国家超过一定数量,可能产生无穷大的边际消费与使用成本。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从竞争性与非竞争性、排他性与非排他性角度对国家自用产品、跨国公共产品、跨国俱乐部产品和跨国自由产品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进行分析,如表 1 所示。

表 1 国家自用产品、跨国公共产品、跨国俱乐部产品与跨国自由产品的区别与联系

	排他性 excludability	非排他性 non-excludability
竞争性	国家自用产品	跨国自由产品
非竞争性	跨国公共产品	跨国俱乐部产品

根据表 1 对以国家为经济活动主体划分的四种类型产品的特征,我们可以对国际社会的所有产品(物品)进行分类,进而分析哪些产品应该由一国单独提供、哪些产品需要由整个国际社会共同提供、哪些产品应该由多个国家共同提供。

五、评述性结论

跨国产品的有效供给是国家之间商品贸易与要素流动的基础。按照前述分析,可以根据产品生产、分配、使用与消费过程中的供给与需求是否跨越一国的地理空间范围,将除自由产品以外的经济产品区分为国家自用产品、跨国公共产品与跨国俱乐部

产品三种类型。一般情况下,国家自用产品主要由本国生产和提供,跨国公共产品则需要由世界各国联合提供,跨国俱乐部产品则需要由多国联合提供。大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会对国家自用产品、跨国公共产品与跨国俱乐部产品的生产、供给、使用、消费与需求产生显著影响,进而影响到国家之间的全球性与区域性双边与多边经济合作,最终影响到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因此,大国之间的相互关系直接影响到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模式与绩效。开放性、小规模经济体作为国际社会中跨国产品供给方式和规则的主要适应者和接受者,只有妥善处理其与大国之间的跨国区域经济合作关系,才有可能充分地获得跨国分工与区域经济合作带来的各种贸易与非贸易利益。大国经济增长变化对跨国公共产品与跨国俱乐部产品均衡需求量变化具有显著影响,直接影响到国际社会中以跨国产品生产、消费、供给、需求和流通为基础的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直接影响到国家之间区域经济合作的范围、内容、方式和效率。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跨国公共产品与跨国俱乐部产品总量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和比重会不断提高,推动着国家之间的全球性与区域性经济合作,进而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

注释:

Thomas Munn(1571-1641)作为最有影响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England's Treasure by Foreign Trade, Reprinte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23)一书中认为,通过国际贸易能够增加一个财富,但必须使本国出口商品的价值大于进口商品的价值。目前,重商主义仍然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经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出现新重商主义(new mercantilism)和新贸易保护主义(new protectionism)抬头现象。有关古典重商主义的研究文献,可以参阅:Newman, P. C.; Gayer, A. D. and Spencer, M. H., 1954. Source Readings in Economic Thought New York: Norton, pp. 24-53; Heckscher, E. F., 1935. Mercantilism, Vol. and . London: Allen & Unwin. 亨利·威廉·斯皮格尔著《经济思想的成长》(上),中文版, 81~10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Spiegel, Henry William, 1991. The Growth of Economic Thought, Duke University Press)。

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 1789-1846)在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认为,虽然自由贸易能够带来利益,但各国获得的利益是不同的,主张在一定时期、一定产业和一定条件下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较早认识到国际贸易与国际经济关系中存在利益分配不公平和利益冲突的可能性。

Samuelson, Paul, 1954.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6, November, pp. 387-389; Samuelson, Paul, 1955. "Diagrammatic Exposition of a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7, November, pp. 350-356; Samuelson, Paul, 1969.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and Taxation" In Margolis and H. Guittou, eds, Public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相关文献评述,可以阅读《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Eatwell, John; Milgate, Murray and Newman, Peter, eds.,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in Four Volumes, pp. 1061-1066, Volume 3, KtoP, The Macmillan Press Limited, 1987, 1991(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第3卷,1133~1138页);郭庆旺、鲁昕、赵志耘编著:《公共经济学大词典》,187~218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公共产品和公共成本概念甚至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论述和解释“霸权稳定论”的核心概念和分析工具。

本文定义的跨国公共品以国家为基本提供、消费和使用单位,但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利益的实现则必须通过消费者、厂商以及政府官员的经济与非经济活动。

对一国国内的消费者和厂商而言,国家自用品包括本国厂商提供、消费者消费与使用的纯私人产品(pure private goods)、纯公共产品(pure public goods)和俱乐部产品(club goods)。

参考文献:

1. 郭庆旺、鲁昕、赵志耘编著:《公共经济学大词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 平新乔、白洁:《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品的供给》,载《财贸经济》,2006(2),第49~55页。
 3. 徐梅:《地方公共投资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
 4. 樊丽明、石绍宾:《关于国际公共品供给与消费的研究综述》,载《经济学动态》,2003(11),第80~83页。
 5.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中文版,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6. 樊勇明主编:《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流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7. K. J. 阿罗、M. D. 英特里盖特总主编:《经济学手册》,见彼得·尼茨坎普主编:《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中文版,第1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8. 陈岩:《国际一体化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9. Alesina and Grilli, Vittorio, 1993. "On the Feasibility of a One-Speed or Multi-Speed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5 (2), pp. 145-166.
 10. Alesina and Barro, Robert, 2002. "Currency Un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 (2), pp. 403-436.
 11. Alesina, Alberto; Angeloni, Igazio and Etro, Federico, 2005. "International Union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5, No. 3, pp. 602-615.
 12. Pigou, A. C., 1928. A study in Public Finance. Macmillan & Co.
 13. Lockwood, Ben, 2002. "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the Cost of Centraliza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9 (2), pp. 313-337.
 14. Lindahl, E. R., 1928. "Some Controversial Questions in the Theory of Taxation," In Musgrave, R. A. and A. T. Peacock, eds., Classics of Public Finance, Macmillan, 1958.
 15. Helpman, E. and Krugman, P. R., 1985.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6. Etro, Federico, 2002.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with Economic Union." Rivista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ociali, Vol. 110, 2, pp. 187-211.
 17. Grossman, Gene M. and Helpman, Elhanan, 2002. Interest Group and Trade Poli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以下文献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N、Q)